黄思. 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的社会基础与实践逻辑［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5（2）：12-20.
HUANG Si. The soci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logic of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6，25（2）：12-20.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6.02.002

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的社会基础与实践逻辑

黄思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基于对山东Y村中药材产业的实地考察，通过建构“主体—能力—效益”分析框架，探讨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的社会基础与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农民以家庭经营形式参与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充分调动熟人社会的内生资源，以抱团发展的形式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嵌入地方社会，在村庄范围内形成横向聚集、纵向体系的乡村特色产业组织形态。而且，基层组织供给公共服务、链接国家资源、维护产业秩序，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升级和正规化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经历村庄—市场双重分工过程，农民家庭在紧密分工过程中建立利益耦合机制，他们在经营内容与利益取向上的一致性与关联性构成经营共同体，强化村庄共同体意识。研究表明，发挥农民主体性与能动性，支持农民家庭经营，有助于激发村庄活力，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关键词：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农民主体性；家庭经营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6）02-0012-09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引导农民发展适合家庭经营的产业项目。该文件指明新阶段发展乡村产业的路径与目标，鼓励农民以家庭经营形式参与产业发展。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壮大县域富民产业的重要抓手，整合县域资源，让更多的农民就近就业，把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地留给农民。因此，关注县域乡村特色产业，分析产业内生发展的社会基础与实践逻辑，有助于厘清政府与农民的角色定位与行为边界，从人民群众的集体创造中汲取智慧，真正实现立农、为农、兴农的乡村振兴。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中央和地方对乡村特色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大，全国各地自发探索多样化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实践，学界围绕这些实践形成丰富研究成果。从主体维度来看，主要有三种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路径。

第一种是资本下乡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路径，资本下乡是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释放政策红利和市场利润等因素共同引致的结果[1]，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就业[2]，促进土地规模经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3]。但是资本下乡的实际效益面临一定争议[4]，在部分实践中农户的土地长远发展收益可能受到挤压[5]，部分地区土地流转领域出现“非粮化”倾向[6]，同时存在因资本自身因要素长期配置失衡而导致项目停止甚至“烂尾”的现象[7]。

第二种是政府主导下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路径。地方政府的动力来自围绕产业形成发展目标约束和政府竞争激励的激励结构，为获得相对优势积极培育地方产业[8]。但是，在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地方政府在强激励与弱惩罚的激励结构下频繁调整产业方向，一定程度上陷入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困境[9]。而且，地方政府出于治理便利

收稿日期：2025-09-29 **修回日期：**2025-11-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党建引领乡村产业富民的创新机制与优化路径研究”（25CDJ069）
作者简介：黄思，研究方向：基层治理。

化的考虑，偏好向规模农业倾斜的治理策略[10]，即政府存在大户偏好。政府和资本都是以外在于村庄的力量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在村庄落地发展，在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规模想象”和“去小农化”趋势[11]，是悬浮于村庄、脱离小农户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方式，不利于乡村可持续发展。

当前，许多学者注意到发挥村庄内生力量的可能性，关注村社理性的积极作用[12]，如通过村集体带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是一种强调村庄自主性和农民主动性的内生型乡村产业发展方式[13]。村社统筹发挥积极作用，在土地配置、农民动员以及公共品供给三个方面，推动以农民家庭经营为基础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14]。不仅能够提升农民家庭的发展能力，保障家庭经营自主权和农业利益完整性[15]，还有助于将产业发展活动嵌入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脉络之中，有助于减缓村庄空心化问题[16]。

以上研究主要从乡村特色产业的发生学角度分析了特色产业的发展路径，从主体—行动视角考察不同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发展效益，背后存在“弱势小农”预设，小农户是被动的客体。诚然，分散小农需要组织和整合，但是农民家庭作为独立经营主体具备自主决策的能力，尊重农民主体性需要理解他们的行动逻辑。因此，对乡村特色产业的全面考察还需要从微观层面考察农民家庭参与产业发展的逻辑与方式，探讨农民家庭经营对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动力、主体，直接影响农民的参与情况，而且影响乡村特色产业收益分配的关键因素主要是农民家庭参与乡村特色产业的方式。

基于此，本研究从农民主体性实践角度出发，关注自下而上的农民集体探索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实践，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探讨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的社会基础与实践逻辑，重点分析了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过程中农民家庭参与方式和组织形式。本研究重点考察鲁西南地区Q县特色产业——中药材产业起源地Y村的产业发展过程，深入认识农民家庭参与乡村特色产业内在动力与产业规模化的扩张机制，有助于明晰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内在机理，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政策制定和地方产业发展探索提供经验支撑和参考依据。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内生发展理论的兴起源于现代化进程中对乡村边缘化问题的反思，也称为内源式发展。1975年，联合国大会报告中正式提出内生发展概念，作为解决乡村发展问题的新模式[17]。从内源式发展的概念发展来看，强调发展的过程由本地控制、发展的选择由本地决定、发展的利益保留在本地[18]。从发展动力来看，内生发展强调从地方社会的内部视角、自下而上地推动乡村社会摆脱发展困境，资源开发、农民参与和地方认同是内生发展的基本要素[19]。从可持续视角来看，内生发展应当重点培育内生主体发展能力、营造共同价值[20]。从发展的具体实践来看，内生发展依托乡村熟人社会进行资源动员、成员动员和观念动员[21]。总体而言，内生发展以内生主体、内生动力、地方资源、发展能力、社会共识等要素为条件，内生发展理论强调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平等发展权利，这一点契合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根本目标。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主要依托本地农业资源，以本地农民为经营主体，受到农民自发参与市场的行为驱动[22]。以乡村特色产业为载体推动乡村内生发展，让农民共同参与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共享乡村特色产业收益，有助于实现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基于此，本研究将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模式定义为以农民为主体、发挥农民能动性、实现产业发展综合效益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模式。并且，沿着“谁来发展—怎么发展—发展效益如何”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脉络，分析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主体、发展能力如何实现发展效益的实践逻辑。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高度嵌入熟人社会结构，熟人社会是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的社会基础，但是社会基础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农民以何种形式组织起来，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二）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分析资料来源于在山东Y村的实地

考察。20世纪70年代开始，该村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小面积药材种植基地，到改革开放后农民自发聚集形成小规模药材集市，现如今发展为国家级中药材专业市场。中药材产业经历近40年发展，产业规模较大，产业链较长，产业体系基本成熟，为该村和周边农户提供参与产业发展的经济空间。Y村共2000余人，400多户，12个村民小组，共有100多公顷（1500多亩）土地，以中药材为主导产业。该村约80%的农户参与中药材产业，形成种植户、销售户、加工户等专业户。计划经济时期，该村划出1.33公顷（200亩）土地种植道地药材，如牡丹、芍药等。20世纪80年代，该村农户自发沿街摆摊形成药材集市，因交易成本更低、药材价格低廉，集市被保留下来，仍然延续逢三、八赶大集的传统，每月有六天集。2014年，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形式建设占地46.67公顷（700亩）的中药材专业市场。专业市场设立市场管委会进行正规化管理，市场内有460间店铺，60%商户为本村人，其余为周边农户。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中药材产业辐射面扩大、产业链延长。截至2024年，该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约0.87万公顷（13万余亩），发展中药材加工业，建设药材产业园。中药材产业已成为该县的支柱产业，带动农民增收、促进地方经济增长效益明显。

基于此，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方法，考察Y村的中药材产业发展历程，分析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农民家庭、村级组织、地方政府的角色与行为，进一步探讨乡村特色产业实现内生发展的实践逻辑。在资料收集阶段，通过深度访谈和实地观察收集一手资料，实地走访药材集市、专业市场、中药饮片厂、山药加工作坊等场地，围绕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村级产业治理、家庭经营、市场管理等主题访谈村干部、种植户、销售户、加工户、饮片厂管理人员、市场管委会管理人员等各类主体30余人。在资料分析阶段，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方法，通过梳理中药材产业的发展历程，沿着“农民参与—集体统筹—地方集聚”脉络解释乡村特色产业如何实现就地产业化发展，建构“主体—能力—效益”分析框架解释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的“内生主体—能动发展—综合效益”实践逻辑，以此增进对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实践机理的理解。

三、抱团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的社会基础

发挥“统分结合”经营体制的优势，以农民家庭为参与主体、以基层组织为统筹主体，一方面有助于保持农民家庭经营自主性，在成本优势和弹性优势的基础上动员村集体整合资源，对接自上而下的资源，有助于促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产业发展嵌入熟人社会，有助于发挥熟人社会内部的社会资源的纽带作用，将农民家庭组织在一起实现抱团发展。

（一）以农民家庭为自主决策的经营主体

农民家庭是推动中药材产业发展的直接主体。改革开放之初，为增加家庭非农收入，少数村庄精英发现外地客商来本地采购道地药材，从中发现贩运药材的商机。遂相约十几户农户前往甘肃等地采购药材丰富品种，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回村摆摊形成最早的药材集市。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农户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在村庄通过“传帮带”带动更多农户进入中药材产业，实现扩散经营。后续规模逐步扩大，从农民自发形成的集市、到村级组织统筹建设的地域性专业市场。20世纪90年代初，在集市上卖药材的农户可收入50元/天，对当时普遍务农的村民来说吸引力较大，在经济激励下该村越来越多的农户进入中药材产业。药材销售成为该村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部分农户种植药材或者加工药材，农民的家庭发展动力与中药材产业相互促进。最初为了增加经济收入，少部分村庄精英外出采购，因利润可观吸引更多农户加入，扩大产业规模，增强产业竞争力，产业发展效益辐射范围扩大，甚至吸引周边村农户加入，也为周边村老年人提供打零工的就业机会。

中药材产业最开始只有少部分农户种植和销售，种植规模较小，销售也是以行商的形式在集市上阶段性摆摊。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农户推动产业环节细分，缺少家庭经济资本和经营能力的农户开始专注药材种植环节，以自家土地为主，一般0.27～0.33公顷（4～5亩），种植“一年成”（即当年种当年收）的药材品种，如山药、丹参、益母草等，投入不高但见效快，在非农忙时节这

些种植户在药材市场打零工，如包装工或装卸工。少部分发展为专业种植户，种植规模在0.67公顷（10亩）以上，需流转不从事种植环节农户家的土地，一般种植高投入、高价值、高风险的药材，比如4～5年才能收成的牡丹和白芍。部分农户转向药材加工环节，主要针对本地种植的道地药材，包括山药、丹参、熟地、白芍等品种，初步统计该村有40户山药加工户，3户白芍加工户，这些家庭作坊只能进行药材初加工，一般供给本地中药饮片厂和本村药材市场的门店。在专业市场建设好之后，早期在集市销售药材的农户家庭积累较为丰厚，共计约260户购买专业市场内商住一体的房产，以坐商的形式销售药材。另外，最初不从事药材种植、加工或销售的农户也被吸纳到中药材产业的配套环节，该村有8户运输户，以夫妻搭配的形式运输本地药材，还有部分农户从事餐饮、快递等其他与生产生活相关的配套服务。

当乡村特色产业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农民家庭经营的专业化程度随之提高。究其原因，第一，产业发育阶段环节单一，经营方式简单粗放，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同一产业环节后，该环节利润被分割，难以满足部分农户的利益预期，因此寻求新的利润来源，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上下游拓展产业环节。第二，当产业规模扩大后，随着产业环节分工深化与配套服务的供给，部分农户为提高劳动效率会选择压缩其经营环节，通过提高专业程度、从事单个环节来增强市场竞争力。这是“理性小农”以市场为导向深化生产专业化水平、促进产业环节细分。产业规模扩大带来的经济空间，刺激其他农户涌入该产业，并且在市场导向下自发生成市场供给服务的配套主体。但是当进入该产业的农户数量即将饱和时，农户所获得的利润会被拉到平均水平。所以，如果农户仍然想获得较高利润，就必须通过提高生产专业化水平或者向产业链两端发展，围绕产业发展需要供给市场服务或产品。产业发展的规模效应有助于深化专业分工，而且这种提高生产专业化水平、产业环节细分的分工模式让农民家庭的生产活动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实现产业链延伸和产业良性发展。

（二）以基层组织为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

基层组织是推动中药材产业升级的统筹主体。村庄既是农民的生产空间也是生活空间，农户的角色也是复合性的。农户作为市场主体具有多重社会角色，包括村组干部、民间组织成员、家族权威等。特别是村组干部都是兼业干部，他们是产业发展带头人或者经济效益突出的精英群体。他们的村干部身份与经营主体角色重合，他们的利益在村，与乡村特色产业发展高度关联，有较强的意愿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并将其与村庄治理结合。而且，他们更了解其他农户的产业发展需求，对产业发展规划有更清晰的认识，有助于形成更务实的村级产业治理行为。因而，村组干部有较强的动力推动村级组织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统筹作用。

在乡村特色产业规模扩大过程中，农民家庭也会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产生内生需求。基层组织将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治理的抓手，与村民自治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有助于以治理促发展。同时，产业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公共建设是单家独户难以解决的问题，基层组织需要具备回应农户需求的能力，围绕产业发展供给公共品和基本秩序，解决单个农户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如基础设施建设、集市经营秩序等。否则在单纯的市场逻辑下，分散的农户意见统一成本较高，面临公共建设成本高、组织成本无人承担的发展困境，乡村特色产业可能只是昙花一现，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且，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外部市场收益有限倒逼本地市场竞争，农户之间因为相互恶性竞争对产业发展秩序产生负面影响，还需基层组织维持产业经营秩序，塑造、维持良好的产业发展秩序。

中药材产业发展初期是农户自发在村中心摆摊集聚，形成药材集市的雏形，早期参与的农户较少，基本可以维持自发秩序。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药材集市，村中心的空间容纳不下。1993年，为了扩大药材集市规模，村级组织主动向乡镇申请将村主干道从4米拓宽到16米。而且，药材集市规模扩大后，具有人员复杂、流动性大的特征，存在无序摆摊、占道经营、影响交通、纠纷增多等问题，因此村干部在药材集市开市期间负责维持基本秩序，协调农户因摆摊占位

的矛盾，调解农户与客户交易纠纷。1998年，药材集市蓬勃发展，但是集市辐射面扩大、人员增多，不便于管理，因此，村级组织希望建设固定市场对药材集市进行规范化管理，与乡镇政府合力推动建设新的固定市场，利用村庄中空闲的小学校园搭建简易市场，村干部、党员带头搬进市场，以此示范、动员集市中其他药材摊贩搬到新市场。2014年，该村中药材产业发展势头良好，辐射周边村，带动本地农民创业就业，县政府积极推动、村级组织积极申请建设专业市场，村级组织动员农户流转土地、协商土地流转费。新的专业市场启用后，原有的市场因地理位置偏僻被弃用，市场与村民聚居点之间修建长度为1公里的马路，道路宽阔、交通便利，成了新的露天集市场地，村委会在本村聘请专人打扫卫生。从该村中药材产业发展历程来看，基层组织承担公共服务供给、向上链接资源、维护产业秩序的职责，为推动产业升级作出贡献。

（三）以熟人社会为产业嵌入的地域范围

熟人社会是中药材产业形成地方集聚的空间，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是高度嵌入地方社会关系的经济组织形式。这种以“家庭经营、村庄集聚”的形式实现就地产业化发展，村庄既是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具体空间，还承载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主体的社会关系。一方面，在产业发育阶段，进入产业的信息、技术、资金等要素是以亲缘、地缘关系等紧密社会关系为纽带在农民家庭之间传播，是通过强关系进行的社会动员。这种在充分动员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的“传帮带”，使农户之间通过低成本学习进入低门槛产业，可以迅速在村庄场域中实现乡村特色产业的扩散经营[24]，快速扩大产业规模，形成规模积聚效应。一般易于模仿、传播的乡村特色产业具有低门槛特征，与农民家庭经营能力相匹配，单个家庭容易进入该产业，且难以对其他人形成排斥。同时，在乡村的熟人社会中，农民家庭经营遵循风险厌恶逻辑，只有他们信任的人进入新的产业且获得可观收入后才会模仿[25]。因此，作为重要社会支持系统的亲属关系成为农户带动亲属进入该产业的主要渠道，还能够在“恩惠”过程中积累人情面子。

另一方面，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基于亲缘关系、地缘关系等建立起来的家庭协作网络是与具体的空间相联系的，并且在协作过程中逐渐形成趋于稳定的关系，农户之间的交易成本比较低。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专业市场是嵌入地方社会的经济空间，村庄中高密度的社会关系为农户的经济行为提供信任基础[26]。农户既是市场主体又是村民，双重角色为市场交易提供便利。农户以地方社会作为产业集聚范围，以社会关系作为产业协作纽带，发挥地方性共识等要素作用，提高产业内部运作效率，在熟人社会内部的信任基础上进行市场交易，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增强整体市场竞争力的目标。

从产业运作的角度来看，乡村特色产业的专业化程度提高，产业环节分化程度必然相应提升，各环节之间聚集在相近的空间内有助于充分动员村庄社会资本，减少运输时间等，从而降低各环节的协作成本，整体提高该村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在药材销售环节，农户需要共同外出采购药材，药材种类的丰富性和专业性是竞争力来源之一。但是单家独户的单一品种药材的采购量相对有限，市场中有亲缘关系或好友关系的农户会在采购时抱团合作，不仅有助于丰富进货品类，共同进货还有利于提高议价能力、降低资金压力。在平时销售药材的过程中，农户之间互相调货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农户如果没有客户需要的药材品种，会去相熟的农户那里以成本价调货，并不会在一次交易中直接竞争客户。

四、紧密分工：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的实践逻辑

在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过程中，农民家庭通过村庄—市场的双重专业分工实现能动发展，建立经营共同体。首先，在以农民家庭为经营主体的基础上的生产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是在村庄内部的专业分工体系。其次，在村庄形成产业集聚和市场优势后，以村庄为单位在外部统一大市场中参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专业分工，在这个过程中该村只是市场分工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通过双重分工过程实现村庄的两次整合，在第一次专业分工过程中，农户建立利益勾连的形式，实践利益耦合的过程；在第二次专业分工过程中，农户建立共同利益的边

界，成为利益耦合的基础。紧密分工是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的演进逻辑和生产组织形式，农民家庭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和能动性基础上有机组合在一起，在彼此之间通过围绕产业发展的经济活动实现利益耦合，并且这种经济利益的整合有助于促进村庄社会整合。

（一）内生主体：家庭经营与弹性优势

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是以本地农民家庭为经营主体。产业发育阶段和规模扩张都是在村庄内部完成的，生产经营的商品化、专业化与市场化程度较高。农民以家庭经营的形式直接参与产业发展，产业达到一定规模后进而对农户的家庭经营决策产生影响，在农户自主决策的基础上围绕乡村特色产业环节进行专业分工，农户在生产专业化过程中推动产业横向规模化发展，并且在家庭发展动力推动下促进产业环节细分。如中药材产业逐渐衍生出专门的种植、加工、销售等环节，形成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在生产环节，有种植户、加工户和饮片厂等。在销售环节，有专业市场中的个体户、集市上的摊主、饮片厂的业务员等。该村农户销售药材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在专业市场内有固定门店的坐商，另一种是在村中心主街逢集市时摆摊的行商。两种模式并不完全分开，专业市场中的坐商也会去集市摆摊。并且围绕中药材生产、销售，配套有农资、运输、装卸、包装等服务主体。

农民家庭是具有自主决策能力的市场主体，以家庭经营的形式参与乡村特色产业。家庭经营的成本优势与弹性优势与乡村特色产业技术含量低、准入门槛不高的乡土特征具有内在契合性。一方面，农民家庭经营形式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具有成本优势，农民在家庭内部配置劳动力，利用家庭资源作为生产资料，劳动力成本和生产资料成本、内部交易成本比较低[23]。其中，劳动力成本又包括基本生活成本、人力资源成本和监督成本，在家庭内部生活的成员，劳动力成本几乎不计算在内，并且家庭成员可以为家庭发展目标进行最大限度的自我剥削，劳动的监督成本也比较低。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基础比较好，他们形成发展合力是降低沟通成本的关键。而且，家庭经营的形式降低生产继替成本，即人力资源成本较低。在药材销售环节，农户需要专业的药材质量鉴别能力和资金、人脉等资源，在家庭内部可以低成本方式实现传递和积累，而且家庭经营过程中农户家庭生活与生产的边界模糊，培养家庭下一代的成本比较低，从小在这一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比新进入该产业的人学习成本、适应成本更低。当地村民形容这一过程“像搓麻绳，慢慢就捻进去了”。生产资料成本主要是土地和宅基地，在集体土地所有制背景下，农民有免费承包、使用土地和宅基地份额的成员权，比如药材加工作坊基本都是利用自家房屋。

另一方面，家庭经营具有“船小好掉头”的弹性优势，这是农民家庭经营生命力和市场适应力的重要体现。农民家庭在自主决策过程中进入中药材产业，根据家庭经营能力选择经营内容，并且在家庭生命周期有侧重地调整经营策略，是一种契合家庭发展要求的家庭经营策略，弹性比较强。这种家庭经营的弹性受到家庭经营能力与家庭经营动力的影响，具体而言，农民家庭经营能力是由家庭资本、劳动力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家庭经营动力则主要受到家庭生命周期和家庭经营能力的共同影响。当家庭生命周期处于劳动力比例较低、受供养比例较高阶段，家庭再生产的压力较大，当其具备一定的经营能力时，农户偏好选择经济收益更高、风险更高的经营性生产活动。药材销售是经营性活动，在“传帮带”作用下村庄中大多数农户进入该产业环节。少部分家庭资产较少、缺乏经营能力的农户则选择种植药材，或者从事配套服务。但是当农民家庭生命周期进入劳动力比例较高、受供养比例较低的阶段，家庭发展的经济压力减小，更偏好收缩经营项目、降低生产风险，选择更具“性价比”的家庭劳动力配置模式与经营活动。

（二）规模扩张：双重分工与利益耦合

农民家庭是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的内生主体，家庭再生产动力有助于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乡村特色产业的横向规模化与纵向体系化的实现，是农民发挥主观能动性主体性实践与集体探索的结果。经历产业发育与产业规模扩张阶段，中药材产业分化出多个产业环节，既有本地生产环节、加工环节，也有对外销售环节，这些产业环节是以专业分工为基础，各环节之间紧密连接、彼此依赖。从种植到销售的过程

中，只有参与各环节的市场主体之间达成合作，才能将最初的农产品变为消费者可接受的中药材。这种以能人带动为起点的乡村特色产业，吸引大多数农户参与产业发展，农民家庭通过“抱团发展”在村庄范围内形成产业聚集，实现外部规模效应，有助于降低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在外部大市场上增强乡村特色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在产业发育阶段，能人带动、农户参与和村庄集聚过程中形成产业规模，仅限于在单个产业环节中市场主体单纯在数量上增长，以此产生横向规模效应，有助于打开市场知名度，形成产地优势和市场中介优势。在实现横向规模集聚后，农户通过专业分工细分产业环节，在合作基础上形成产业链，达到纵向规模效应，实现产业一体化发展，这一点构成提升乡村特色产业在外部大市场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在双重分工基础上，农民家庭的经营活动被整合到一起，分散农户之间建立利益耦合机制。他们具有自主决策权，作为市场主体选择从事何种经营活动，在能人带动和扩散经营的过程中农民家庭的经营活动具有趋同性，产业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增强该产业的市场竞争力，直观的经济利润刺激农民家庭进一步“抱团发展”，使得各产业环节中的市场主体之间建立利益关联和利益耦合机制。利益耦合机制的建立还需要通过实践将其落地、固定，否则发生利益冲突时这种利益耦合机制就变得非常脆弱和容易解体。产业环节相互依赖，产业一体化发展将分散农户的经济利益整合在一起，通过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带来的经济利益和利益分配过程来实践利益耦合机制。也就是说，产业链接打通了各产业环节的产品流通渠道，将各个产业环节的分散农户勾连起来，最终输送到市场中并生成产品利润，基于此农民家庭的经济利益也具有了连贯性和一致性。在循环往复的产业运作过程中，这种利益勾连模式和利益耦合机制不断被调动起来，深化农民家庭对乡村特色产业利益共同体的共识。而且，产业链接不是抽象的产业环节之间的勾连，而是具体的市场主体之间建立的稳定交易形式和利益关系。特别是当这种交易形式和利益关系建立在原有的村庄熟人社会基础之上，市场主体间的关系不仅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还受面对面熟人关系的影响，是在不损害个人利益的前提下对亲朋好友的互惠行为。

（三）综合效益：共同经营与社会整合

乡村特色产业以农民家庭为经营主体，他们在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基础上构建经营共同体，在经济利益和社会交往方面具有高度一致性和多重关联性。在乡村熟人社会中，信息透明化和信任程度较高，有效提高交易效率与经济利益，有助于强化分散农户的利益耦合机制与社会整合意识。不同于城市的陌生社会，市场主体之间建立的是匿名性的市场交易，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交易风险较大等问题。但是乡村特色产业高度嵌入村庄社会，同时专业市场是坐商交易形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农民家庭在经营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乡村特色产业在内生发展过程中经济活动高度嵌入村庄社会，村庄将流动的市场资源在某些环节整合在具体的、固定的空间内，熟人社会的性质使得市场主体之间增加信息对称和相互信任程度，极大降低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和提高交易效率。而且在村庄之外的市场主体看来，信息的汇集、产品的丰富等优势都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与具体空间结合的规模产业生成产地优势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这种对外部市场主体的吸引力也有助于整合分散农户。

从经济层面来看，双重专业分工过程明晰村庄的利益边界与利益结构，产业一体化和产业环节链接使得农民家庭的利益具有一致性或关联性。农民家庭作为市场主体是产业环节链接的实践载体，通过建构利益耦合机制形成经营共同体，并且在经济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共同作用下勾连产业环节，实践利益耦合机制。而且，乡村特色产业的准入门槛不高，在村庄内部具有非垄断性，难以让农民家庭在经济利益的激励下分化为多个利益取向不同的利益群体并形成激烈竞争。产业门槛不高还具有另一个影响，在同一产业环节中，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存在去分化效应，在市场需求端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进入同一产业的农民家庭越多，相对稳定的市场利润要分配的对象越多，也越不容易形成两极分化的情况。加之，农民家庭的经营活动存在回避竞争的机制，他们通过合作增强规模效应和促进产业升级更有益于整体利益最大化，这种回避竞争机制增强经营共同体对单个农民家庭的保护作用，促进社会整合。

从社会层面来看，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为农民

提供“家门口”的经济机会，农民的生产、生活并未完全脱离村庄，农民的身份意识具有一贯性和一致性，社会地位没有等级分疏。农民还是在他们自小长大、熟悉的村庄场域中生产、生活，基本上对个人身份的认同还是农民。因而，在村庄内部虽然有经济分化，但是没有明显的社会分化，原有的村庄秩序能够有效保持。相比之下，当农民以分散形式进入外部市场时，职业分疏往往成为社会分化的主要动力，而且不同职业的就业地点、就业形式、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具有较大差异，使农民在关系和地位上形成较大分化，如工业雇佣关系中因为经济两极分化带来的不平等的依附关系。农民家庭的经营活动具有一致性或相关性，参与同一个乡村特色产业的农民家庭在实践过程中建构出一套村庄共享的产业经营知识。这些知识是在原有的地方性共识基础上新增的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共识，包括技术、规范、习俗和共同的劳作模式[27]，使得农民共享一套身体体验和地方共识，促进农民形成共同体意识。

五、结语

乡村全面振兴必须以农民为主体，深入挖掘地方特色资源，培育让农民广泛参与、深度受益的乡村特色产业，达到增加农民经济收入、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本文考察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实践逻辑，乡村特色产业的内生发展是以农民家庭为主体，以“家庭经营、村庄集聚”的形式实现外部规模经济效应。这一过程中充分发挥内生主体的能动性，农民家庭动员熟人社会内生资源，通过抱团发展形式在地域社会形成产业集聚，并且在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驱动下推动产业双重分工，增强乡村特色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在纵向的产业一体化和横向的产业规模化过程中，农民家庭之间实现深度利益耦合，在农民增收和村庄共同致富的过程中形成对村级组织的认同感，增强对村庄的归属感，促进村庄社会整合。乡村特色产业以农民家庭为主体，为乡村振兴注入产业活力，在经济层面为农民提供经济机会、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在社会层面提高村庄凝聚力、稳定村庄社会秩序；在文化层面丰富乡村文化内涵，传承和发展乡村特色文化。

改革开放后，随着一系列政策出台，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农民家庭作为生产经营单位重新获得经营自主权和择业权，农民可以自由向城市流动，农村的经济社会分化速度加快。中西部地区农村的“去生产化”趋势将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剥离，降低他们生产与生活的一体化程度。远离市场中心的农村难以为农民家庭提供足够的经济空间，农村很难成为满足他们实现家庭再生产的载体。当农民家庭为了生计、教育等目标使得家庭成员分散在不同区域，他们的经济状况、社会境遇、与村庄的利益关联度都发生了剧变，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村庄共同体也会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村庄的空心化、无主体化[28]进一步压缩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可能空间。促进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是重建乡村经济体系的过程，在农村地区为农民提供创业、就业的经济空间与可能性，让他们能够在家门口就业，在保障收入的同时能够保证家庭生活的完整性与村庄社会秩序的稳定性，提高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参 考 文 献

[1] 涂圣伟. 工商资本下乡的适宜领域及其困境摆脱[J]. 改革，2014（9）：73-82.
[2] 侯江华. 资本下乡：农民的视角——基于全国214个村3203位农户的调查[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81-87.
[3] 刘魏，张应良，李国珍,等. 工商资本下乡、要素配置与农业生产效率[J]. 农业技术经济，2018（9）：4-19.
[4] 杨雪锋. 资本下乡：为农增利还是与农争利？——基于浙江嵊州S村调查[J]. 公共行政评论，2017，10（2）：67-84，194.
[5] 郭亮. 资本下乡与山林流转来自湖北S镇的经验[J]. 社会，2011，31（3）：114-137.
[6] 高晓燕，赵宏倩. 工商资本下乡“非粮化”现象的诱因及长效对策[J]. 经济问题，2021（3）：92-99.
[7] 周振. 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跑路烂尾”之谜:基于要素配置的研究视角[J]. 中国农村观察，2020（2）：34-46.
[8] 冯猛. 基层政府与地方产业选择——基于四东县的调查[J]. 社会学研究，2014，29（2）：145-169，244-245.
[9] 刘军强，鲁宇，李振. 积极的惰性——基层政府产业结构调整的运作机制分析[J]. 社会学研究，2017，32（5）：140-165，245.
[10] 孙新华，钟涨宝. 地方治理便利化：规模农业发展的治理逻辑——以皖南河镇为例[J]. 中国行政管

理，2017（3）：31-37.
[11] 冯小. 去小农化：国家主导发展下的农业转型[D].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15：90.
[12] 何慧丽，邱建生，高俊，等. 政府理性与村社理性：中国的两大“比较优势”[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6）：39-44.
[13] 耿言虎. 村庄内生型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实践——以云南省芒田村茶产业发展为例[J]. 学习与探索，2019（1）：24-30.
[14] 陈靖，冯小. 农业转型的社区动力及村社治理机制——基于陕西D县河滩村冬枣产业规模化的考察[J]. 中国农村观察，2019（1）：2-14.
[15] 韩庆龄. 村社统筹：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组织机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3）：34-43.
[16] 吴重庆. 追寻内生的力量——“隙地”“狭地”“边地”的“空心化”反向运动[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1）：29-41.
[17] 张环宙，黄超超，周永广. 内生式发展模式研究综述[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61-68.
[18] Barke M，Newton M. The EU LEADER initiative and 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gramme in two rural areas of Andalusia，Southern Spain[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1997，13（3）：319-341.
[19] 张文明，章志敏. 资源·参与·认同：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J]. 社会科学，2018（11）：75-85.
[20] 严红. 农村内生式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实践逻辑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2024（3）：103-115.
[21] 马荟，庞欣，奚云霄，等. 熟人社会、村庄动员与内源式发展——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J]. 中国农村观察，2020（3）：28-41.
[22] 袁明宝. 内生型特色农业发展中的市场吸纳与产业秩序建构[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4，16（6）：86-98，155.
[23] 项飙.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59.
[24] 项飙.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M]. 北京：三联书店，2000.
[25] 高更和，石磊. 专业村形成历程及影响因素研究——以豫西南3个专业村为例[J]. 经济地理，2011，31（7）：1165-1170.
[26] 艾云，周雪光. 资本缺失条件下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兴起——以一个乡镇农业市场为例[J]. 中国社会科学，2013（8）：85-101，206.
[27] 蔡磊. 劳作模式与村落共同体——京南沿村荆编考察[J]. 民俗研究，2012（6）：123-130.
[28] 田鹏.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变迁及秩序重建[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3）：119-128.

The soci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logic of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HUANG S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dustry in Y Village, Shan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oci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logic of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 by constructing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ubject-ability-benefit".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rmers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in the form of household operation, fully mobilize the endogenous resources of the acquaintance society, promote the embedding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into the local society , thus forming a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organization characterized by horizontal aggregation and vertical system within the village. In addition,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provide public services, connect national resources, maintain industrial order, and promote the upgrading and regularization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has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dual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village and market, and the farmer household have established a interest coupling mechanism in the intensive division of labor process, and the consistency and relevance in their business content and interest orientation constitute a business community, which strengthens the sense of village communit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subjectivity and initiative of farmers and supporting farmers′ household operation is conducive to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villages, promoting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promoting farmers′ income, and realizing the all-round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Keywords: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Endogenous development; Farmer′s subjectivity; Household operation